

老照片

说不尽的张学良 徐宗懋
重温“新闻图片” 沛 力
侧目“辽沈”的感受 李 杰
北平之恋 嘉 蔚
“中国军团”的兴衰 张建国
同仁堂乐松生的家族 杨友龙
50年前的和平签名 史耀增
往昔“少女”的聚会 谢文秀
70年前的外企白领 邢志远

山东画报出版社



少女 （摄于20世纪40年代） 锐明 供稿



结婚照（摄于20世纪30年代） 刘巍峰 供稿

徐宗懋	说不尽的张学良	1
沛 力	重温“新闻图片”	20
孙建三	照片和我们家的故事	29
李 杰	侧目“辽沈”的感受	40
英 子	战争间隙里的军人们	49
邓廷辉	你们在哪里	56
吴玉桐	“哥俩”	58
嘉 蔚	北平之恋	60
张建国	“中国军团”的兴衰	74
张 鸣	褡裢和旗袍	85
彭 锦	惊心“6.8”	88
张立华	赵凤琴的故事	94
杨友龙	同仁堂乐松生的家族	104
史耀增	50年前的和平签名	107
李 功	我的苏联红军战友	109
邢志远	70年前的外企白领	121
谢文秀	往昔“少女”的聚会	129
刘溢 石坚	解放前的解放	135
伊 丽	我的父母亲和兄妹们	141
祝欣梅	人间真情	150

老照片

王代赞	由彭山崖墓而感·····	153
王丁丁	关于磨昌照片的补充·····	156
白丽丹	白壁微瑕·····	157

封二 少女(说明) 中插 我的苏联红军战友
(李功) 70年前的外企白领(邢志远) 同仁堂
乐松生的家族(杨友龙) 50年前的和平签名
(史耀增) 封三 结婚照(刘巍峰)

来函照登(杨小齐 59) 穴居人家(健莉 73)
29军野战医院一景(张洪杰 84) 帕西瓦尔“走
麦城”(林心 128) 来函照登(尹跃奇 152)

《老照片》丛书

三 编

刘瑞琳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杰
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涛

征 稿

《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6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稿件的要求：所提供的照片须是20年以前拍摄的（翻拍件也可），且有一定的清晰度，一幅或若干幅照片介绍某个事件、某个人物、某种风物或某种时尚。文章围绕照片撰写，体裁不拘，字迹工整，传记、散文、随笔、考据、说明均可。

编辑部对投寄来的照片稿件，无论刊用与否，都精心保管并严格实行退稿。稿件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来稿请寄：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山东画报出版社
《老照片》编辑部 邮 编：250001 E-mail: 14071@371.net

电 话：(0531) 2060055 转 5410（编辑部）2052472（发行部）

邮购办法：请汇书款至上述地址，并注明所购书目。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名人一瞬·

说不尽的张学良

徐宗懋

张学良先生走了。尽管他一辈子期盼回到东北老家，原来受到软禁不得自由行动，但等到恢复自由身时，他却又带着老伴远赴美国檀香山，十余年来婉拒了“叶落归根”的邀约，最终选择埋骨异乡。

不仅如此，这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英雄甚至将他的个人资料文件、包括口述历史悉数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96年，张学良发表声明指出，“捐给哥大的材料，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纪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其余的将在2002年，与哥大为我作的口述历史，全部公开展出。”主持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的哥大中文讲师张之丙说，1996年后张学良的材料陆续运来，目前计划依当初的约定，于2002年6月开放部分已整理好的材料，包括颇具争议的如西安事变的相关资料。换句话说，无论张学良如何受到中国各党各派的赞美，他最终将自己的历史的证言存放在美国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在北京或台北，其良苦用心，颇耐玩味，也反映了少帅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一贯精神。

6月转眼将届，似乎很多事情到时可以真相大白，不过海外的史学界是很小的圈子，而且彼此之间口风并不紧，据看过资料的人转述，所谓的机密材料其实已没有那么机密，真正比较值得品味的是张学良对几个军阀的看法，十分生动有趣。至于为何机密不再是机密，因为过去10年内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国际研讨会已开过几次，其中有一些十分出色的论文。至于张学良与中国共产



张作霖遭关东军陷害后,未满 30 岁的张学良成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

党的关系,大陆方面也陆陆续续公布相关的电文、信函和会议纪录,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在几次访问中也吐露了不少,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已足以架构历史真相,澄清某些疑点,并打破过去的刻



张学良与杨宇霆在一起。

板印象。

依笔者浅见，有关张学良的历史争议主要有二：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角色。本文试着整理这两项史实，以为参考。关于“不抵抗政策”，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中已说得很清楚。当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约有四十余万，张学良率十余万主力进入关内，沈阳只留守少数兵力。张学良说：“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以后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根据日方的史料显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战事爆发后，请求朝鲜军增援。9月19日，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称该军一部正开往沈阳，参谋本部指示暂缓。这一天若规礼次郎内阁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通知了本庄司令官，然而关东军的高级幕僚石原莞尔等却不服从命令，决定放手蛮干。他们刻意在吉林激化情势，再出兵吉林，朝鲜军亦擅自出动，进入中国境内。关东军和朝鲜军违反军令，独断独行，应属重大罪行。然而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不仅未予咎责，反而被迫承认这项军事行动。可见军部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嚣张至极，既不把侵略当一回事，也没把国际局势放在眼里，

他们根据本身的野心和计划，肆无忌惮地用兵，拖着日本政府走向侵略，也就是走向一条最终亡国的不归路。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同对日本的判断有关，他以为考虑到国际的压力，关东军会很快地撤兵，因此东北



军若以弱击 1930年，张学良在北戴河游泳时与东北空军副司令徐世英的留影。

强，不仅无法战胜，反予关东军扩大战争的口实。不料关东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受到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就被赶出了家乡。至于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张学良的回答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口气。他说：“关于这一点，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央的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这等于说，中央政府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没有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

的当，扩大事端。那时我如果知道日本真正的意图，情况可能变成两样。”

张学良的证词绘出了大致的历史轮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原因是他判断日军不会无视国际舆论发动战争，因此希望以忍隐妥协的方式让日军找不到扩大事端强夺土地的借口，只能草草收兵。至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虽然指示“相应处理”，但其对时局的判断与张氏相去不远，何况日本内阁已通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又有谁能料到军部自行其是不受约束？

无论如何，东北丢了，东北军成了流亡部队。张学良在国人交相指责下，既羞愧又焦虑。对这支部队和指挥官而言，没有一件事能比抗日雪耻、打回老家更重要了。这种心情使得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如何统一全国的力量上很容易出现分歧，急着找日军较量的张学良对于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内耗，自然较一般人更感到厌恶与不解，东北军也满怀抵制情绪，为日后的西安事变提供了土壤。

在进入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局势此一课题之前，我们或可对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实际政治军事操作以及中国之一般国情，有一客观的理解，如此比较能解释某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清朝覆亡，共和成立以后，尽管孙中山心仪的是西方的代议政体，然而代议政治的基本发展条件如中产阶级兴起、资本累积、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公共传媒、社会团体、城乡规划等等，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或者只是在起步阶段。而上述条件的累积只有依赖国家性的组织力量始得以进行，老式科举制度为本的文官体系已被打破，近代的官僚体系尚未成型，较具组织功能的机器只剩下军队，因此军队的职能必然膨胀，作为维护秩序、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清朝覆亡以后的中国即处于这种微妙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催生强大的组织化力量，以抵御外侮，



1930年，进入北平的东北军仍背长剑持长矛，反映了新旧交替的时代。



东北军进入北平后，为维持城内秩序，逮捕当地盗匪恶霸。

维持秩序、发展民生和解决各种问题等等。另一方面，过去王朝崩溃后的现象又起，包括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根据过去的例子，最后脱颖而出的通常是眼界开阔、惟材是用、善于隐忍并在关键时刻绝不心慈手软的人物。可以说，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呈现的就是以上两种时代特色的混合。孙中山最初奔走革命，依赖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宗亲组织和江湖帮会，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几近于老式的兄弟拜把。组织力量如此薄弱，又无法切合整个社会体制演进的方向，战斗力自然有限，无法与取代清王朝的北洋军阀抗衡。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集合了东京学成归国具有近代法政军训练的精英、欧洲回来的满腹马克思理论的俊彦以及在苏联顾问指导下成立的新型党军。应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最强大的组织性力量，啼声初试后果然无坚不摧。虽然如此，传统的残留毕竟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仍然带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色彩，任何见风转舵的地方军阀都可就地获得合法的地位，挂出同一面旗帜，然后一有称雄的机会就兴兵“讨逆”。这跟楚汉相争或《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好汉伺机称王，或在几大阵营中待价而沽的情况并无二致。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国民党内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理应以这种角度看待，蒋介石是各路诸侯形式上的共主，但地位并不稳固，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张学良掌兵东北，在相当的观察等待后一举带兵进入北平，支持蒋介石扫平反叛。事成，张氏权力大涨，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政军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各据南北一方。

九一八事变后，张氏地位大受影响，1933年长城抗战，张期盼有所作为，却遭蒋以抗战尚非其时所阻，随后放下兵权出国考察。1934年张学良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基本的思想就是维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同时以和平手段团结各

党派势力共同抗日。这一年他在接见记者时表示：“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派，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摒除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此时的张学良已有明显的联共思想，不过此时处于抵抗追剿的中共尚未意识到张学良是潜在的盟友。8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公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一开始就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侵略掠夺，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

有关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和具体会商的过程，近年大陆史学界引述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打开了一扇过去幽禁的大门，解开了许多谜团。不过在解释这些材料背后的主观情境时，似乎过于渲染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景仰之情。毫无疑问，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共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领导阶层年轻，满怀理想，而且愿意为内心描绘的人间天堂赴汤蹈火。由苏联引进严密组织形态、清规戒律的生活方式加上定期的清理革命队伍，使得这支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革命组织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在纷乱自私的年代，这种纯化的组织和思想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代表着绝不折扣的承诺，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投入，以他们的智慧和英勇，播下革命的种子，并在关键时刻发挥扭转大局的作用。

虽然如此，政治最终毕竟是讲求实力的，权力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实力强弱的对比，在战争的年代，实力更取决于枪杆子的多寡。试想连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在一个时候都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更何况领有17万优良装备部队的张学良？事实上，处于存



1930年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张学良率文武官员谒拜中山陵。

亡关键的中共在掌握东北军厌战的情绪后，即展开大量的工作，1936年1月间，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会见张学良之后，双方实质上已建立了联合抗日的默契，但对于如何对待蒋介石则还有基本的分歧。4月9日，张学良再与周恩来举行关键性的延安会议。席间，张学良坚持“联蒋抗日”，不同意中共的“反蒋抗日”，周则以惯有的圆熟的外交手腕答以“是可以考虑的，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会谈后，张学良拿出两万银圆捐给红军，双方实际上已成盟友的关系。

至于南京方面，戴笠所掌握的情报系统对张学良与中共的亲密关系却毫不知情，但东北军不接受“剿共”的命令却是明显

的事实，蒋介石开始开口骂人，言词粗鲁，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十分沮丧，并在中共代表刘鼎的面前指责蒋介石。7月2日，张闻天给王明的电报中说：“张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要求加入我们的党。”然而海外学者并不采信这份电文的内容，因为随后7月6日，毛、周、张（闻天）、李（克农）、刘鼎等人在安塞举行会议，完全没有讨论张学良入党的问题。周恩来反而要刘鼎“争取张学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至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与中共的关系更有10年之久，其属下要员许多是共产党员，尽管他对红军采取尽可能不打仗的做法，但作为据守一方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本能上他更在乎保存本身的实力。因此在要求一致抗日以及保存本身军队的实力避免自相残杀的情况下，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出现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空间，三者之间实唇亡齿寒。从蒋介石对中央军的布防和调动来看，红军被消灭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紧接着改组解散已不可避免。

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示只能“联蒋”，不能“反蒋”。策略上，中共调整成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进而联合蒋介石推动全国性的抗日政府。在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写给国民党要员和地方实力派人物许多私人信函，以感性的口吻呼吁团结抗日。11月，中共代表潘汉年抵南京，两度会晤陈立夫。12月1日，毛泽东等19位中共领导人致蒋一函，言词感人：“介石先生台鉴：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中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人

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

这封半文言体的信函洋溢着少见的书香味和复古风。红军的处境仍极为艰困，虽然在山城堡打了一场胜仗，但弹药粮草难以补给，兵员不断流失。毛泽东几次电请张学良再助一臂之力，但张一时也无计可施，东北军正受中央军的压迫，本身都有被牵制的可能。12月4日，蒋介石率文武大员二十余人，乘火车抵西安，连日召见东北、西北两军师长以上军官个别谈话，并在排除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下，举行了部署第六次“围剿”的军事会议。蒋已决定东北军和西北军为第六次“围剿”打前锋，由中央军在后督战，如两军不战，则调往他地，由中央军直接“剿共”，但张不从此议，反而连日力劝蒋改变“安内攘外”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7日张、杨初步提到对蒋实行兵谏的计划，9日西安大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共同抗日，军警开枪，张大受刺激。11日，蒋介石在召开“剿共”布置会议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要员群聚绥靖公署大楼，由张、杨宣布对蒋兵谏，并规划各部任务。12日清晨5时许，蒋介石的行营华清池外枪声大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爆发。关于事变前后数日的情况，各方多已留下丰富的证言，但仍以张学良本身的说法最为直接。1990年，张学良曾接受台湾史学家郭冠英和旅美学者唐德刚制作口述历史，张学良过世后，这段访谈终于公开。他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